

史詩般的記憶——戰火下東西方的博物館

詹彩芸

戰爭是權力、領土、人民、財富、知識…等，各個方面從新洗牌的最激烈手段，正因為它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永久性破壞，人們開始逃難，處於流離失所、國破家亡的狀態，在這種動盪不安、自顧不暇的大時代，往往也發生非常多令人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，譬如：二次大戰期間，德國商人辛德勒（Oskar Schindler）冒著生命危險，散盡家產，拯救為數可觀的波蘭猶太人，免於魂斷在納粹大屠殺的暴行下；齊邦媛在她2009年出版的「巨流河」巨著中，也娓娓道出，她個人、家族、同胞在抗日及國共內戰期間的艱險逃難歷程，以及許許多多熱血青年，奮不顧身保家衛國的愛國情操…。少為人知的是，在這人類逃亡的大遷徙中，有一群無名英雄為了大我，小心翼翼地守護著博物館的收藏品，為留存珍貴的歷史文物與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永續做出極大的貢獻。本文將講述東西方兩大博物館 - 巴黎的羅浮宮與北京的故宮博物院 - 之文物，在二次大戰期間，是如何逃過被敵人竊取及戰火摧毀的命運。

上世紀三〇和四〇年代是人類史上最動盪不安、死傷最為慘烈的年代。1931年的918事變，日本關東軍與中國東北軍在中國東北發生軍事衝突，日本對華的侵略野心自此昭然若揭，有鑑於此，位於南京的國民政府下令，要故宮博物院精選珍貴文物，開始進行裝箱作業；1933年當日本軍跨越連結關內與關外的關鍵防衛哨—山海關時，日本軍閥勢力更是節節逼近文化古都北平

（1949年中共政權改名為北京），為了文物安全考量，國府下令立即把裝妥箱的文物運離北平；但此一決定並未獲得故宮博物院的主管及北平重要人士的一致認同，尤其是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與古物審查會專門委員吳瀛（字景洲）間，更為此事有過激烈爭論。吳瀛辯稱：「古物一出神武門的圈子，問題非常多，責任既重，閒話也多，內外的敵人，都等待著！我們最好不做此事！¹」易培基則立刻與以反駁並說：「你這話全是為私，大敵當前，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，我們都不應考慮這些問題，推卸責任！²」至於北平重要人士如：胡適與周兆祥（前古物陳列所所長）都表達反對意見，胡適反對的理由與建議有三點：首先是，在國際社會的不斷關注下，沒有任何一處比北平更安全，日本軍閥不敢隨意掠奪或破壞故宮博物院的文物；再者，在運送途中，要確保如此大量之文物的安全，是件非常困難的任務，況且，一件文物之損毀是永遠無法挽救的；最後，胡適建議在不同的城市如：上海、南京、洛陽等地設立博物館，用於分散故宮文物之典藏³。反對聲浪之大，使得國府不得不出來發表聲明表示：「故宮文物，是國家數千年來的文物結晶，毀掉一件，就少一件，國亡有復國之日，文化一亡，將永無法補救。古物留在這裡，萬一平津作了戰場，來不及搶運，我們是不是心痛？⁴」最後，1933年2月6日的夜晚，北平在局部宵禁的情況下，裝滿第一批故宮文物的火車緩緩駛離北

平，開始長達十六年的避難歷程。

運離北平之文物約有19,630箱，分別來自北平不同的文化單位，如：故宮博物院、古物陳列所、國子監、頤和園等，所有文物首先運抵上海的法、英租界區，部分愛國人士視國寶存放外國租界區為一項國恥，因此呼籲快速覓得新的存放地點，直到1937年1月以南京朝天宮為主的故宮分院及新的庫房落成後，所有文物運到南京，才結束這種言論的紛擾。短暫的歇息後，日軍於1937年8月直逼上海，國府再度下令將文物分送到安全地方，在倉促中，僅有約16,700箱的文物來得及運離南京，其他的則存放在南京新建的庫房中。

運離南京的文物則分三批運往中國內陸。第一批的80箱由莊尚嚴負責押運，箱內的所有精美文物於1936年底至1937年初間，參加在倫敦舉辦的中國文物特展，這應該是中國皇家所典藏之文物，第一次這麼大量的呈現在西方觀眾眼前。該批文物首先用船隻沿著長江及湘江運到長沙，在日軍轟炸長沙的前一天，這80箱又匆促地以卡車運送到貴陽，於1944年冬天，在日軍抵達貴州前，該批文物已安全地運抵四川的巴縣存放。第二批裝載7,286箱的文物由那志良及其他館員負責，該批文物從南京浦口火車站出發開往陝西，沿路在寶雞及漢中稍作停留外，因日軍節節逼近，不得不緊急趕運到較為安全的大後方存放。運送如此大量的文物翻山越嶺、穿渡河流並非簡單的事，除了要克服自然環境及天候的險阻之外，也得沿途預防土匪的搶劫，幸虧有軍方的戒備協助，終於在1939年的7月運抵四川峨嵋。第三批9,369箱文物在吳玉璋等人的押運下，以商船沿著長江和岷江逆流而上，沿途行經武漢、重慶及宜賓，最後於1939年的夏末運抵樂山存放。

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，原本擬把所有文物運

返北平的計畫，在中共解放軍攻佔東北與華北之領土的情況下，改將一萬六千多箱文物集中在重慶，以船隻順著長江於1947年7月底運抵南京。此刻，國共內戰的情勢愈演愈烈，為維護文物的安全，1948年11月10日杭立武、朱家驊、王世杰、傅斯年、李濟等人於時任的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宅邸開會，決定先把文物運送到台灣避險，負責這次任務的總指揮杭立武，亦立刻致電人已回到北平故宮博物院處理善後的馬衡院長，盼他將留在故宮博物院內的重要文物快快裝箱運到南京，人亦來南京與其他人會合，但馬衡以心臟不適為由，不但人未到南京，也未送出任何一件文物，在他回給杭立武的電報中寫道：「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未批，以後不再續運。⁵」由於時間緊迫，運輸工具缺乏，無法將所有文物送往台灣，選件作業則由以下四位專家執行：莊尚嚴負責書畫、那志良負責玉器、梁廷煒負責古籍和吳玉璋負責陶瓷器物，最後共計運到台灣的文物檔案共計2,972箱。運抵台灣的文物先存放在霧峰的北溝，直到1965年台北故宮博物院落成後，才存放在外雙溪至今。而留存在南京的文物，中共政權於五〇年代間分三批，將部分文物運返北京，卻在1957年發起的大規模反右運動的階級鬥爭中嘎然而止，至今仍有一部份文物留在南京博物院中。

同一時期的歐洲大陸也正面臨戰火的肆虐，因有一次大戰的前車之鑑，為使國家文物免於受到炮火的潑及與敵軍的掠奪，法國政府於1930年代開始思考撤離博物館文物到安全地方的計畫，不出所料，納粹在1940年6月14日進入巴黎後，立刻成立藝術品保護單位（Service de protection des œuvres d' art, Kunstschutz），負責執行搶奪藝術品任務，尤其是被納粹視為「無主」（sans maître）的猶太人的收藏更是首當其衝，知名的巴黎猶太家族Rothschild的藏品因此立刻被盯上且被

沒收充公；而法國國家博物館重要的典藏品，在 Jacques Jaujard⁶的主導下，自1938年起，陸續撤離巴黎，運往位於法國西部和南部省份的城堡內存放，1939年8月起，裝滿羅浮宮及其他國家博物館共計四千多箱的重要文物，首先被運往羅亞爾河流域的城堡內存放，隨著戰局的變化，又將文物轉運到底里牛斯山一帶的城堡，羅浮宮的鎮館之寶「蒙娜麗莎的微笑」也在1939年8月28日運出羅浮宮，前往安全的地方暫放。1939年8月至12月間，共計有37批作品運離巴黎，每批作品由5到8輛數量不等的卡車運送，運送過程中，車隊前後都有車子做前導與押運。

1944年8月勒克萊爾將軍（général Leclerc）解放巴黎後，暫存在法國外省各地城堡的國家文物，陸續運返原來所屬的博物館，羅浮宮也在經過一番整理後，於1947年重新對外開放。1945年5月納粹投降後，被納粹侵占的藝術品也陸續歸還給物主，而未找到物主的藝術品，目前都仍由法國國家博物館總署（direct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）保管，並以「國家博物館，收回」（MNR, Musées nationaux, récupération）註名作品的來源，物主至今都還有權利取回其所有物⁷。

戰火往往迫使人顛沛流離、文物古蹟損毀，但有一群無名英雄，默默地堅守著崗位，小心翼翼地守護著文物，伴隨著文物到處大遷徙，為的是保存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見證。今日當我們駐足在羅浮宮或是故宮博物院欣賞文物時，除了讚嘆先人的文化藝術造詣外，更應感念這群好漢為後人所付出的一切。

註解

1. 吳瀛，2005。故宮塵夢錄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頁178。
2. 同上註，頁178。
3. 吳十洲，1998。紫禁城的黎明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頁201及202。
4. 那志良，1993。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，台北：作者出版，頁83。
5. 馬衡，2006。馬衡日記－1949年前後的故宮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頁23。
6. Jacques Jaujard於1933年擔任法國國家博物館副主席（sous-directeur des Musées nationaux），並於1939年12月接替 Henri Verne擔任主席一職。
7. Cf. Le catalogue de l'exposition :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: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-1947, 2009 Paris, Musée du Louvre ; Jean-Paul Cointet, 2010, « Un musée fantôme » in Historia, spécial septembre-octobre, pp. 72 et 73

（本文作者為巴黎政治學院博士）

本會董監事業已改組

一、新任董監事名單如下：

董事長：張國恩

董事兼執行長：賴守正

董事兼副執行長：李青青

董事：邱大環、許秋煌、陳淑華、陳學毅、郭嘉偉、劉增泉、鄭治桂、藍健民

監察人：李念祖、梁蓉、梁孫傑

（以上名單以姓氏筆畫順序排列）

二、任期：三年，自民國102年1月1日起至民國104年12月31日止。